

華僑移殖文化觀

梁子衡

有人認為：華僑是帶着三把刀（菜刀、剪刀、剃刀）而移殖海外，而認定了華僑移殖經濟觀。

有人認為：華僑是以粵、閩兩省人士為多，因粵、閩臨海，與東南亞各地毗鄰，而認定了華僑移殖地緣觀。

有人認為：華僑移殖以明、清兩代為衆，因明、清兩代戰亂頻仍，外侮日多，國人被迫出國，而認定了華僑移殖政治觀。

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均能言之成理，不可否認。但嚴格來說：華僑移殖海外，經濟因素是動機，文化因素是動力。因此，我認定了華僑移殖文化觀。

筆者常說，華僑移殖海外，是中國內部轉變其中的一個結果，而中國內部轉變，有經濟因素、政治因素，軍事因素，和文化因素。但文化因素是轉變中的軌道，一切發展多難超出文化這一軌道。

民族史學家羅香林教授認為中國民族的遷徙曾形成三大支流：

第一支流為「秦雍流人」。他們原居於今日

陝西、甘肅、及山西。後沿漢水流域，順流而下，渡長江而達洞庭湖區域；更遠的是，溯湘水而轉至桂林，沿西江而入廣東的中部或西部。

第二支流為「司豫流人」。他們原居於今日

河南以及河北，後展轉南遷，而沿汝水繼續南下，渡長江後，分布於江西鄱湖區域，或達皖、蘇的中部；或溯贛江而至粵、贛、閩交界之地區。

第三支流為「青徐流人」。他們原居於今日

山東，以及江蘇、安徽，後展轉流徙，循淮水而下，繼越長江，分布於太湖區域；更遠的，則分布於浙江、福建的沿海；東晉以至宋、齊、梁、陳的中樞人物，多屬這一支流的份子。

以上三大支流「流人」的遷徙方向，多由北而南，由內陸而沿海。

研究客家氏系的學者認為客家的源流大約分為六期：

第一期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，曾遣大軍戍守大廈，以防南蠻入侵，守兵留居粵北。

第二期：東晉永嘉後，五胡亂華，居民紛向

南遷，進入江西贛江。

第三期：唐朝末年，黃巢稱亂，舉族南遷惠州、韶州等地。

第四期：宋高宗南渡，客家先民奮起勤王，從文天祥轉戰江南而死者幾千萬人，所遺老弱，乃轉至粵北、粵東。

第五期：明末流寇作亂，客人攜家南渡。

第六期：乾、嘉以後，客家在粵之台山、開平、四會一帶人口大增，一部遷徙在高、欽、雷等地。

客屬南遷路線，有江左線、淮南線、光州線、南進線、和外洋線。

這裏所謂「外洋線」，亦是中華民族內部轉變的一個超越國界的方向。

中國經濟文化的支撐點，唐中葉以前，偏倚在北方，唐中葉以後偏倚在南方。亦為歷史學家所承認的事實。

歸納這些看法，可以說，唐、宋以前，中國文化經濟在內部流轉；唐、宋以後，特別是清以後，中國文化經濟則在國內外相互衝擊下轉變了。

中國內部轉變的結果：中國民族在文化、經濟的壓力之下，國人由北向南「走」，由內陸向沿海「走」，由沿海向國外「走」，而形成了「流人國際化」。

二

中國無「國界」，乃以文化為「國界」；中國文化無「界線」乃以道義為「界線」。

孔子主張民本主義，重視文化觀念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指出民族主義：

「何為民族主義？即民族主義之精神也」。

「最高尚之民族主義範圍，則以意志為依據」。

「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基礎。」

「民族主義是世界大同的基礎。」

這裏所指的「精神」、「意志」都是屬於文化的範疇。

中國社會的本位為家庭、家庭組織的本位為血統。

中國社會為父系社會。父兄向外走，家庭亦隨之向外走。父傳子、子傳孫。亦可以說：父引子、子引孫，形成一條親族移民的走廊。家族向外走的結果，是「家族世界化」。

國人向外移殖，以粵、閩同胞為多，深一層來說，乃是文化因素所影響。

首先是西方文化的挑撥。梁啟超教授分析：

「十九世紀白色帝國主義的刺激，在文化上有張之洞『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』的反應。」

「廿世紀赤色帝國主義的刺激，有陳獨秀『

中國文化根本差異論』和李大釗『中國文明調和論』的反應。

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，世界政治思潮的刺激，有張君勱『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』和梁漱溟『西方文化接受改造論』的反應。」

「新大陸霸權東漸的刺激，有胡適『西方文化全盤接受論』的反應。」

「法西斯主義的刺激，有薩孟武、陶希聖十大教授『中國本位文化論』和熊十力『西方文化毒素論』的反應。」

此外，由於民國五十四年，中共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刺激（反動），而有民國五十六年，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」的反應。

其次是嶺南文化的衝力：

嶺南文化具備了，活動、飛躍、追求的「流人精神」。

嶺南文化具備了，不滿現實，反抗現實的「充軍精神」。

道光廿一年（一八四一年），香港割讓於英國，為世界最大的航業中心；歐美傳教士亦多經由香港而進入中國；中國人亦多經由香港而走向世界。

孔子的大同思想，激發了中國人四海一家的抱負。

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，開展了中國人世界大同的理想。

中國文化安定了中國人的心理；西方文化挑動了中國人的感情。華僑是中國人中受西方文化挑撥，向外衝刺，最具活力的一羣。

中國向外移民，是帶着三把刀作為生活的工具；而非因為有了三把刀而後向外移民。

三

中國文化具備了雙重特性，一放一收，一開一合，彈性極強。

筆者常說：西方移民如放炮竹，劈下一聲化為烏有；日本移民如移殖花木，只求其在海外園地、開花、結果，欣欣向榮；中國移民如放風箏，長牽一線，永不脫手遠蕩，此一線就是文化線。

海外華僑社會一向循着中國文化一開一合，一放一收的性格而迂迴曲折地發展前進：

生活外求，是向世界；精神內向，留戀祖國；

漂洋過海以向國外求發展，而隨身攜帶的仍是中國的東西——一是祖宗（神位）、一是生活工具（三把刀）、一是信仰（工人帶魯班師，婦女帶觀音、媽祖、僑團帶關公）；

在中國而具有世界大同，天下一家的抱負；在國外仍不放棄民族、家族的思想。

例如：

華僑社團：宗親組織似是「一道窄門」，而徐、余、余同親，許、譚、謝、談一家，則是「一座大廈」。

華僑經濟：由商業資本轉為工業資本，由雜貨店擴展為百貨公司，由零售商轉為批發商，是一種開放；而工廠家族化，公司家庭化，則是一種保守。

華僑文教：由接受中國文化、教育到接受僑居地文化、教育，是一種發展；而不斷奮鬥，以求僑校國內化，則是一種內向。

上述這些情況，無一不是受到中國文化性格的約束。

近代國際大量移民，始於十五及十六世紀。自十七世紀。自十七世紀初葉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大約有四千五百萬人自歐洲移殖北美洲。自十六世紀到目前，大約有二千餘萬人自南歐移至中南美洲。百餘年來，大約有一千七百萬英國、荷蘭，及其他有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移入非洲及大洋洲。

我國對外移民，到目前統計（華僑、華裔）僅有二千一百萬多人。中國人在海外到處有「唐人街」，歐洲人移民國外，少有「歐人街」。當然，其中的因素很多，但主要是西方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而跟物質走，財富在那裏，生命就在那裏；中國人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跟道義走，財富在那裏，生命不一定就在那裏。

中國移民的動力在文化，使中國移民精神內向也是文化。

經濟動機引發了文化的動力；文化動力支持了經濟的動機，這是華僑移殖的一大特色。

四

共產國家甚少向外移民。因為共產主義透過「國有」這一美麗的名詞，把什麼都據為「黨有」，連人民也一樣據為「黨有」，除「幹部」外輸，以進行滲透顛覆活動之外，絕不容許國人有移徙的自由。

筆者常分析中共統治大陸有幾個層次：軍事層次，以殘暴瘋狂佔了便宜；到了由軍事層次要轉入政治層次的時候，中共感到在中國社會的原有基礎下，無法安定，乃企圖以經濟層次來搶救政治層次；當它進入經濟層次，更難取得中國社會的協調，便認定非徹底粉碎中國原有社會結構和文化基礎不可，乃而進入文化層次，掀起了所謂「文化大革命運動」。

中共對海外的統戰，提出所謂「統一、認同、回歸」等等陰謀。儘管它在政治分化、社會滲透、經濟利誘各方面做得非常積極；在軍事上標榜強大，在政治上標榜進步，在經濟上標榜躍進，但却不敢在中國文化上自稱正統。它是代表馬、列、史的共產主義傳統，而絕不敢自認代表中國的文化傳統。

中共因衝不破華僑社會牢不可破的「文化層」，乃亦無法在華僑社會取得統戰的勝利。

如果華僑移殖因素單純是經濟性，中共早已運用經濟利誘來瓦解華僑社會；

如果華僑移殖因素單純是地緣性，中共亦早已運用分化滲透手段來瓦解華僑社會；

如果華僑移殖因素單純是政治性，中共也早已運用政治威迫來瓦解華僑社會；

惟因華僑移殖因素是文化性，中共乃始終衝不破華僑社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壓力，而達到其統戰的目的。

五

筆者認為華僑移殖既是出於經濟為動機，文化為動力。我們似乎可以根據文化學、社會學政

治學、經濟學、人類學等有關科學綜合研究來建立「華僑學」，而且可以建立一套「三民主義華僑學」。

我們知道三民主義的精神背景是中國傳統文化。中國文化是「倫理、民主、科學」，這一文化內涵與華僑社會的文化精神正相吻合。

筆者常說：華僑思想發展的階梯：愛家思想的昇華為民族主義，亦即家族思想大同化；自由思想的昇華為民權主義，亦即自由思想政治化；生活思想的昇華為民生主義，亦即生活思想社會化。

我們如果將華僑這些思想發展的階梯，加以系統性之研究，將必能創立一套完整的「三民主義華僑學」。

華僑在僑居地，從民族方面言：他們多生在多元民族的社會。民族主義開闊、平等、互助的精神正是維系各民族平等相處的要素。

華僑在僑居地，從民權方面而言：他們只有在民主社會始能生存，我們要保護華僑，就得首先保護民主政治制度。

華僑在僑居地，從民生方面言：他們多處在多元性的經濟環境，必須在自由經濟制度下始能發展。民生主義的目的，在改善人民生活，增加人民福利，使人人富足，享受安居樂業的生活。這正是現代世界經濟思想的主流，也唯有如此，才能確保華僑在各地生存的權利。

因此，三民主義華僑學的建立並非毫無所據，亦非完全空想。筆者試作此一大胆的建議，以期對華僑問題有興趣的學者專家加以推動。